



聊城英烈谱

1939年6月3日,日军占据了冠县城。随即,他们组织建立了政府、皇协军、警察局、宪兵队、宣抚班、新民会等日伪组织,搜罗招募汉奸,修城墙、筑碉堡,派款、要粮、抓壮丁,祸害群众,镇压抗日运动。

为适应新的政治和军事斗争需要,更有力地打击敌人、惩治汉奸,保卫县委和抗日县政府的安全,1939年7月1日,冠县县委在城西南吕屯村成立了由县委直接领导的武装工作队(简称“武工队”),王登铭为队长,郭九峰为指导员,队员有米国斌、刘玉珍、张金铭、霍金斗、靖鸿恩、郑俊亮、张玉合、任金昆、董占秋、沙俊耀等十三四人。他们都配有匣子枪或手枪,还有手榴弹等武器。其主要任务是,宣传抗日,扩大党的影响,袭扰日军,镇压汉奸、特务和叛徒,打击国民党顽固分子,保护人民群众,保卫县委领导干部。

1939年7月14日,中共鲁西区第一地委书记张炳元(字柏江)于朝城县化庄被国民党顽固派王金祥部特务营营长马泽远杀害。为纪念张炳元,冠县县委将武工队改名为“柏江队”。

1939年8月13日,“柏江队”队长王登铭在去王谈二寨开展工作时,被国民党冠县六区常备队教练许广荣杀害。冠县县委随即任命张金铭为队长。指导员郭九峰被调任一区区长,未到职就被敌人逮捕,刘玉珍继任“柏江队”指导员。后张金铭回家探亲,被敌人侦知捕杀,米国斌继任队长。1940年夏,刘玉珍调任县工救会主任,米国斌调任一区队队长,县委任命任金昆为“柏江队”队长,沙俊耀任指导

员,并增加了马会府、郑署生、宋西安、任金玉、董占林等10名队员。这些同志,都是县委选拔的立场坚定、英勇善战的共产党员。

“柏江队”队员们有时三三两两地在县城周围,有时乔装打扮到日军司令部执行任务,有时集中兵力突然消灭敌人,战略战术机动灵活,搞得敌人晕头转向,日夜不得安宁。

其战术之一,叫“牵着敌人鼻子转”。一次,日本宪兵队长领着几十名日军和百余名伪军,从县城北门出了城。他们刚到栅栏门,就听到北关西北松林里响起枪声,子弹向栅栏门射来。日伪军跑步将松林包围,搜索后,只找到了几个空弹壳。日本宪兵队长举起望远镜寻找目标,枪声却在高三里庄西南松林中响起。他带领队伍奔向高三里庄,还未停稳脚步,范庄东头又响起枪声。他们随即追到范庄东头,枪声又从李八里庄传来。之后,他们从李八里庄追到崔八里庄、前田平、小化村、直隶村、代屯,最后追到了东关庙。盒子枪的连发声、手榴弹的爆炸声,引诱着敌人转了整整一个大圈。宪兵队长带着大队人马匆忙应战了半天,被拖得筋疲力尽,结果也没看到“柏江队”一个人影。其实,这次只不过是两三个“柏江队”队员在与他们周旋。

战术之二是“联手打伏击战”。1941年青纱帐战役刚过,日军一个小队带着两挺机枪和80多名伪军在城南一带抢足了财物。“柏江队”获取情报后,立即埋伏在北寺地村北。当敌人回城时,驻在白塔集的三区游击队首先发起攻击。敌人不知虚实,携带抢

掠的牛、驴、包裹,一边退一边还击,正好退到北寺地村北埋伏圈。“柏江队”队员们立即发起战斗,打得敌人狼狈不堪。同时,预先埋伏在张义堡村的民兵自卫队也发起了冲锋。敌人受到三面夹击,溃不成军,丢下抢掠的财物逃往城内。这次战斗共击毙日军3人、伪军14人,缴获轻机枪一挺、步枪8支,敌人抢掠的大部分财物被截获,“柏江队”、游击队、自卫队无一伤亡。从此,小股敌人再也不敢轻易出城抢掠百姓了。

战术之三是“虎穴掏心”。土匪韩春河带领几十人当了汉奸后,驻在北关关帝庙内。他的副官抢来一个农家女做小老婆,住在北关栅栏门内的周家宅院西屋里。一天晚上,4名“柏江队”队员突然进入北关。其中两名队员放哨警戒,两名队员翻墙跨入周家院内,踢开了副官的房门。副官还没爬出被窝,便束手就擒,嘴里塞着毛巾被拉出北关,到仅距关帝庙百米左右的地方,被匕首刺死。队员们将事先准备好的布告放在副官头下。天亮后,敌人发现尸体,个个不寒而栗,再一看那写着“奉命处决汉奸某某某,执法人柏江队”字样的布告,更是吓破了胆。

战术之四是“凤凰夺窝”。1942年冬,许某某拉起一个由10多人组成的“黑吃队”,驻在冠(县)、馆(陶)两县交界的尹固村。这里是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西渡卫河通往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要道之一。“黑吃队”盘踞于此,不仅严重危害这一带的群众,而且严重影响抗日活动。冠县县委命“柏江队”迅速除掉这一祸患。一天半夜时分,许某某带队外出抢劫,只留下做饭看门的伙

『柏江队』神出鬼没的

夫。不一会儿,10多名“柏江队”队员全进了尹固“黑吃队”巢穴。伙夫误认为自己人回来了,说:“饭还没熟哩,回来得这么早啊?”当“柏江队”队员的枪口对准他的脑壳时,他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天将明的时候,院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,是“黑吃队”回窝了。“柏江队”队员让那个伙夫开门迎接并喊话:“辛苦了,肉包子好香啊,快来吃吧!”“黑吃队”一窝蜂似的拥进院内,还没来得及进厨房,就听到“不准动,举起手来”的喊声。他们闻声望去,只见房上、房下、窗口、墙角,到处都是对准脑袋的枪口,于是全乖乖地做了俘虏。根据政策,“柏江队”只处决了许某某,其余人员经教育后一律释放。

“柏江队”的事迹还有很多,如化装进城搞情报、袭扰日伪据点、查获资敌分子、保卫县委安全等。这些事迹,都将永远传颂在冠县人民中间。

中共冠县县委党史研究中心

『保险箱』 粪坑中的

□ 武敬达 孙善英

1940年,结婚不久的张延积和张荣夫妇被党组织派往鲁西北抗日根据地——回族古镇张鲁集一带开展地下工作,被安置在抗日堡垒户——张鲁北街李福臣家里。在居住的一间小小的土屋里,他们召开秘密会议,布置党的工作,发展新的同志,印传单、写标语,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。

1942年6月24日凌晨,张延积夫妇在莘县张鲁镇南无村开了一夜的村干部秘密会后,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往驻地张鲁时,得知日军在进攻张鲁,镇长李仲允正在带领民兵阻击敌人,掩护群众撤离,他们夫妻俩立即加入了阻击的队伍,与李仲允一起指挥战斗。

当黑压压的日伪军冲上来的时候,张延积夫妇心中所惧的并非自身的生死。他们从入党参加革命的那天

起,就做好了为革命献身的思想准备,而且多年来他们已经多次经历过身处绝境、死而复生的险境。他们真正担心的是他们那间小土屋——在那间不起眼的小土屋里存放着上级的秘密文件、工作计划和安排部署的相关文件,还有附近几个村的村干部和党员骨干名单。这些资料一旦被敌人搜去,党的地下组织就会被破坏,不仅所有努力前功尽弃,更会致使多位同志牺牲,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。这一重大责任迫使他们必须立刻返回住处,将这类关乎生命和工作成败的重要资料迅速收藏或销毁,对这些资料的保护,就是对党员干部生命的保护。他们夫妇二人虽然身在村外,但他们的心早已飞回了那间小屋。

可是,当前的形势又不容他们离开,敌众我寡,只能阻击一时而无力阻挡敌人进村破坏,况且眼前阻击的游击小组人员少、武器差、缺乏专业训练,战斗力弱。张延积夫妇都是来自正规部队、经过正规训练、富有作战经验,他们是阻击队伍中的骨干和主心骨。他们沉着、镇定的指挥是这场阻击战强有力的保障,只有阻击了敌人,才能延缓敌人进攻时间,让全村的群众撤退到马颊河以西地带。在这关系群众生命的关键时刻,他们俩必须坚守阵

地,一刻也不能离开。

由于他们的成功阻击,村里的群众和粮食实现安全转移。敌人“扫荡”结束后,出城抢粮的敌人一无所获。可是,在这次阻击中,他们也付出了代价,镇长李仲允献出了宝贵的生命,张延积的无价之宝——那些放在居住土屋里的重要资料也不翼而飞,片纸没留。

令他们欣慰的是群众得救,粮食和财产保住了,而让他们痛心不已、万分内疚和遗憾的是那些重要资料的丢失,这会直接导致附近村里的党员干部身份暴露。想到这,张延积觉得自己罪责深重。正当张延积夫妇一筹莫展地看着屋内的一切,捶胸顿足、懊丧无奈、后悔莫及的时候,房东李福臣走了进来,看到眼前的情形,猜透了老张的心思,宽慰他说:“张同志,看你满头冒汗,是否病了?”张延积有些无奈地答道:“没有啊!”“你准是病了,而且得的是心病。”老李肯定地说。“别添乱了,我心烦得不得了。”张延积不耐烦地摆摆手说。“我有一副药,保你药到病除。”李福臣继续说道。“什么药?”张延积夫妇奇怪了。李福臣没回答,只是走到粪坑处,用农具挖出了一个瓷坛,掀去盖着的瓦盆,从坛中掏出了一件件“宝贝”。张延积一见,眼睛亮了,

立刻上前查阅了一番,上级秘密文件、党员干部名单、工作资料俱在,一样不少。张延积像做梦一样惊喜地赞叹:“你的这副药,贵似千金,天下难寻,真是妙手回春,药到病除,我的心病全好了!”

原来,李福臣夫妻俩见张延积夫妇外出开会未归,便急中生智,在敌人“扫荡”前就把资料统统放在坛子里,口上倒扣上一个瓦盆,挖坑埋在粪坑里,上面再洒上大粪,又脏又臭,这样敌人就不会接近、更谈不上找到这些资料了。

李福臣虽然不是党员,也没有参加党的地下秘密活动,但是他是可靠的堡垒户,懂得张延积夫妇办的都是正经事,从不打听、过问,更不会泄密。这次大“扫荡”正赶上张延积夫妇外出开会未归,他虽然不知道放在屋内的是什么,但他意识到这些资料都很重要,决不能落入敌人之手。于是,他们夫妻俩对如何保护好那些资料进行了一番合计,如果带着外逃,一是担心丢失,二是担心遇到敌人搜索。但是,放在家中,家徒四壁的,容易被敌人搜索到。最后,夫妻俩就想到了这个办法,借助粪坑和瓷坛,不但保存了党的重要资料,同时也掩护了党在农村的革命力量。

文章摘自《聊城百篇红色故事》

本版资料由中共聊城市委党史研究院(聊城市地方史志研究院)提供